
花園莊東地 H3 坑甲骨 的閱讀方法

史亞當 (Adam Craig SCHWARTZ)

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

龐琨譯

本文以 1991 年花園莊東地 H3 坑出土的卜辭記錄為材料，集中探討其商代記事者的工作習慣和動機。這一群史官與另一群貞卜人物同時隸屬於當時某一位高權重的王子，兩個專業群體共同開發出一套作業技術並付諸實踐，以經濟簡便的方式分工合作，連貫且有效地完成他們的工作。這批甲骨刻辭體現出高度的同質性和統一性，反映當時史官已能精準地記錄卜筮內容，而且在專門記錄的設計、書寫和規範呈現等方面，他們也具備獨特的辦事能力和創造力。更重要的是，從刻辭行款可見他們對材料的把握，體現了商代史官的知識水平，並意味著刻寫卜辭實為了日後閱讀和翻查之用。

關鍵詞：商代文字記事 專業工作習慣和動機

甲骨占卜 上古知識水平

緒言

花園莊東地甲骨（下簡稱「花東甲骨」）最早發現於 1991 年，2003 年以六冊對開本全部公布出版，這是一個密集的共時語料庫（*synchronically compact corpus*），其中包含了晚商時期（約公元前 1250– 前 1045 年）的數千條獨立卜辭，它們刻在數以百計的完整龜甲和牛肩胛骨上。¹ 這些甲骨卜辭屬於第 27 代商王武丁在位時的某位王子，它們無疑是中國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契刻發現之一。而且，這組出土材料在甲骨學研究方面，尤其是在決策斷疑以及記錄歸檔方面，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統計學方法導向的語料庫。早期中國領域的研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仰賴於更多完整甲骨的發現，以揭示貞卜人物和史官共同製作這些物質文獻的操作方法和專業技術。花東甲骨是一個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6 冊（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後文用 HYZ（花園莊）這個縮寫來代指這批甲骨。如 HYZ181.5 指第 181 片，第 5 條。坑中共發現 689 片卜骨，絕大多數是龜腹甲（659）；剩下的是龜背甲（25）和牛肩胛骨（5）。經過綴合，2003 年的正式出版物中包括了 561 片甲骨的彩色照片、剖面放大圖以及刻辭的拓片和摹本。在去除重複、進一步綴合以及減去背面刻辭的數量（30）之後，卜骨的總數為 529，包括 511 片龜腹甲、13 片龜背甲和 5 片牛肩胛骨。關於本文引用的花東甲骨的討論和其他信息，參 A.C. Schwartz,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from Huayuanzhuang East*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9)。

展現商代貞卜人物和書記官之習慣與動機的理想語料庫。²

關於古代社會的知識水平，一個相當有趣的話題是，商代甲骨史官的自主權到底有多大（甚或是否存在），這也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尚未充分研究的一個問題。本文將甲骨刻辭視作物質文獻，著重探討其筆畫和行款，以圖證明製作 H3 坑甲骨刻辭的史官實際上遠不止是記錄口述的熟練刻工，也不是只會機械地複製給定的材料。³

史官與貞卜人物合作，在 529 塊龜甲牛骨上留下了 2452 條卜辭，他們所採用的技術不僅證明了準確的甲骨占卜的專業性，對於我所要討論的問題來說，也許更重要的

2 Keightley (吉德煒) 曾說：「儘管已懸隔三千餘載，商代晚期（約公元前 1250–前 1045 年）的甲骨刻辭有時會直接讓我們感受到，商代貞卜人物和書記官有非常傑出的工作習慣和動機。」David N. Keightley, “Theology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uth and the Ancestors in the Wu Ding Divination Records,” in *These Bones Shall Rise Again: Selected Writings on Early China*, ed. Henry Rosemont Jr.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207.

3 張桂光的研究使我獲益匪淺。參張桂光：〈花園莊東地卜甲刻辭行款略說〉，王建生、朱岐祥：《花園莊東地甲骨論叢》（臺北：聖環圖書，2006 年），頁 65–67。本文亦曾參考下列三種文獻。劉源：〈試論殷墟花園莊東地卜辭的行款〉，《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1 期，頁 112–116。章秀霞：〈花東卜辭行款走向與卜兆組合式的整理和研究〉，收入王宇信等主編：《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 11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中國福山）》（北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174–192。孫亞冰：《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34–98。

是，這證明了表演性的口語是如何一步步通過設計和排布而形成書面記錄，再記載到燒灼過的骨頭上的。與在安陽為商王工作的史官類似，花東的史官也採用了一些經濟簡便的方法來具體調度工作量，並在保持形式和設計的美感的同時，連貫而高效地完成他們的工作。⁴我認為，史官對花東甲骨卜辭所進行的排布和書寫，其目的就是用於閱讀和查閱。

- 4 在花東刻辭中，最好的一個例子或許是，這群史官記錄卜骨的兆豐用辭及其兆側命辭時，所使用的短語是「用」和「不用」，而不是「茲用」和「茲不用」。指示代詞「茲」指的是一個特定的兆豐，亦即骨面上與「茲」距離最近的一個，故而「茲用」的意思就是「用這個（兆豐）」。「用」則是「茲用」的簡寫。史官大概無需寫明「茲卜用」，因為「兆豐」本身已經昭然於骨面，也可以視作一個字，所以不必特綴「卜」字。（「卜」字本就象骨面兆豐之形。）「用」比「茲卜用」更加簡潔、連貫、高效，也是一種風格創新。甲骨卜辭如果是寫在易朽壞的材料上，那麼這種縮寫就不會清晰可辨了。圖 1 說明了史官如何圍繞兆豐設計各種「用」的布局。關於商代甲骨文中「茲用」的研究，首創於胡厚宣：〈釋茲用茲御〉，收入宋鎮豪、段志洪等：《甲骨文獻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18 冊，頁 1-5。關於「用」與「不用」如何判斷，參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1 卷甲骨文卷，頁 321-322；以及〈釋「厄」〉，同上，頁 457。又參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頁 198。倪德衛也曾說，「它（茲用）是用來解讀兆豐的。」參 David N. Keightley, *Working for His Majesty*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2), 366.

花東甲骨刻辭的統一性和可解讀性使其成為一個理想的數據庫，可以用來研究非王卜辭的某些貞卜人物和史官集團的占卜實踐及其機制。本研究回顧了文獻表達的風格和習慣，並提出如何將這些標準作為方法和手段來補充正字法分析，以推斷史官的身分，並判斷安陽史官傳統中的知識水平。⁵ 我的重點是通過研究各種行款（即文本的排布與朝向）和文檔或稱「頁面」的設計風格，來完善閱讀花園莊東地甲骨文的方法。書寫方向及其相關習慣是花東甲骨書寫的一個整體的主位（emic）特徵，對這些內容的研究闡明了一些細節，從而揭示了專業史官怎樣展示他們的專業知識，以及他們如何設計文本的閱讀效果。⁶

-
- 5 顯微正字分析法現在是甲骨學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崎川隆將賓組甲文類型分為 14 組，崎川隆：《賓組甲骨文分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周忠兵發現了與歷組貞卜人物集團相關聯的新的史官，周忠兵：〈談新劃分出的歷組小類〉，《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222–229。更為明顯的是，學者們嚴重低估了安陽及其他區域與貞卜人物合作的史官的數量。
- 6 本文標題中的「閱讀（read）」一詞就有這個含義。它並不是要介紹或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解釋如何破譯和理解這些刻辭的語言和文字，我最近已經在其他文章中進行了相關研究（Schwartz,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from Huayuanzhuang East*）。

卜辭的書寫流程尚不明確。一種假想是，甲骨刻辭謄寫自貞卜人物的筆記。⁷ 該假想認為，負責在甲骨表面契刻內容的是刻工，他們只是機械地複製給定的材料。另一種假想提出，在實際的占卜過程中，有史官在場，他們或憑藉記憶，或在貞卜人物（們）的幫助之下，於之後的某個時間將原始的口頭表述轉寫為書面記錄。⁸ 當然，有些貞卜人物也完全有可能自行記錄，但貞卜人物和史官是兩個不同的職業群體，這一情況已有明證，因此我還是要將兩者區分開來，儘管他們之間也存在交叉。⁹

7 吉德煒曾介紹過「貞卜人物筆記」這一概念。參 David N. Keightley, “The Diviners’ Notebooks: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s Secondary Sources,” in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Discovery*, ed. Yau Shun-chiu and Chrystelle Maréchal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1), 11–25.

8 張世超：《殷墟甲骨字跡研究——自組卜辭篇》（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9 胡厚宣：〈卜辭記事文字史官簽名例〉，《甲骨文獻集成》，第18冊，頁29–33。他首先指出了出現在甲骨的頂端、底端以及側邊單獨的名字，它們與卜辭不相連屬，胡氏稱之為簽名，並認為這些是在甲骨上契刻卜辭的史官的名字。胡氏指出，這些名字如彀、爭、亘等，與武丁的貞卜人物名字相同。饒宗頤不同意這個看法，他認為，商代青銅器上的史官被稱做「師 X」，甲骨刻辭中有時也會在貞卜人物的名字之前冠以其身分「卜」，但從沒有將類似的這些名字稱作「史」的先例。參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年），頁22–23、27–29。（饒宗頤舉出了兩個以「大（太）史」冠名的例子，但這兩例都不見於已知的商代貞卜

如果沒有「貞卜人物筆記」，就無法了解占卜活動的記錄，也無法了解史官是如何知曉每條兆豐的含義。然而，省略句式和卜辭行款這兩個跡象表明，寫在甲骨上的最終記錄可能經過了編輯和重組。¹⁰ 這組新發現的甲骨文獻有力地表明，史官在書寫卜辭時，會有意識地調節和規整記錄的長度，以取得行文對稱和字數的平衡。他們還可以按照語法成分（短語、分句、句子）和形式單位（敘辭、命辭、占辭、驗辭）來解析占卜記錄。這些甲骨刻辭記錄方法表明了記錄者的專業性，展現了他們的知識水平，更關鍵的是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材料的把握。

人物。) 饒宗頤(同上,頁 29)提出了一個理論,即貞卜人物與史官不能一一對應,只不過兩者之間有所疊合。他這一說法的切入點是,有時單片腹甲上的卜辭書風統一,但卻記錄了多個貞卜人物的名字。此類例子證明,並非所有的貞卜人物都是史官。儘管貞卜人物和史官的身分有時會有疊合,比如,在侯家莊發現的一組龜腹甲刻辭中,貞卜人物的名字常常又出現在正面的底端,但目前比較保守的看法還是將貞卜人物與史官分而視之。見董作賓:〈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甲骨文獻集成》,第 6 冊,頁 105-123。花東卜辭中有一條卜辭比較特殊,記錄了一位盲樂師(瞽)作出的占卜:「辛亥瞽卜:家其句又(有)妾又(有)畀」。其大意为,如果家(舞者的名字)索求妾,那麼他就會得到一些妾(HYZ490.11)。在花東卜辭中,這位盲樂師的工作應該是演奏音樂,他有可能在骨面進行鑲鑿,也有可能對占卜做出解讀,但很難想像是他本人把卜辭刻在甲骨上。

10 自商代甲骨卜辭以降,省略法就成為了中國古典文獻的一個重要特徵和修辭手段。參饒宗頤譯:《近東開闢史詩》(臺北:新文豐,1991年),前言頁 1。

一、讀懂花東甲骨的基本技巧

花東甲骨刻辭可以大致分為卜辭和非卜辭兩種，後者主要是貢納物品清單和簽名。一條完整的花東卜辭包括兆序、¹¹ 記錄該次占卜歷史背景信息的前辭和 / 或後辭、¹² 命辭、占辭、判斷兆豐的用辭，以及複核實際情況的驗辭。以下二例包含了上述所有部分，我對每個部分進行了括注。

例 1 癸酉卜：子其擒。子占曰：其擒。用。
四麋六兔。HYZ 395+548.9

[前辭:] 癸酉卜:[命辭:] 子其擒。[占辭:] 子占曰：其擒。[用辭:] 用。[驗辭:] 四麋六兔。

例 2 壬申卜：子往于田，从昔所。用。擒四鹿。- HYZ 35.1

[前辭:] 壬申卜:[命辭:] 子往于田，从昔所。[用辭:] 用。[驗辭:] 擒四鹿。[兆序:]

11 花東卜辭中的兆序數字最高是十（HYZ 176.1; HYZ 310.2）。兆豐數量常常是三的倍數，最多不超過十。商王的貞卜人物通常使用一組奇數目的甲骨來占卜一件事情，三片龜甲和三塊獸骨是最常見的組合。一般來講，貞卜人物使用兆豐和甲骨數量的多少，標誌著其所卜問對象的重要性。

12 包括日期、貞卜人物名、占卜地點、占卜類型，以及前次占卜的結果或需要事先說明的命辭。

我認為，在兆豐即將裂開或裂開之時，貞卜人物會口述命辭。（至於貞卜人物是否會親自鑽鑿甲骨，則是另一個話題）。¹³ 在花東卜辭中，只有占卜集團的受益者和家族的首領才可以說出對兆豐的預測，即占辭。一條兆豐及其相關命辭是否合用，應當是由貞卜人物判斷。¹⁴ 許多卜辭僅由兆豐、兆序和「用」字組成，圖 1（右）即是一例，這說明一旦兆豐出現，在其他占卜程序之前，首先要把兆序和用辭直接記錄在甲骨上，記錄者或是負責占卜的貞卜人物，或是與貞卜人物合作的史官。一旦所占問之事發生，史官就會寫下驗辭。¹⁵

在卜辭的各部分中，驗辭能夠直接展現史官的知識水準，並證實了史官與貞卜人物的合作關係。與命辭和占辭相對應的驗辭驗證了占卜的過程，是對事件真實性的事後記錄。但與命辭和占辭不同的是，除非與占辭相一致，驗

-
- 13 饒宗頤認為這是兩種不同的職司。參氏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頁 14-28。
- 14 有一例卜辭（HYZ 467.7）的用辭是「子不用」，這表明占卜者和貞卜人物家族的首領參與了兆豐的閱讀。姚萱沒有將「子」當作「不用」的主語（「佳（唯）廌子。不用」），參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6 年），頁 366。
- 15 卜辭是分時段完成的，類似觀點參見裘錫圭：〈釋「厄」〉，頁 457。裘文所揭諸例表明，其他貞卜人物和史官的卜辭中的用辭和驗辭似乎是在不同時間由不同的史官所寫的。

辭幾乎不記錄口頭表述。¹⁶ 前舉兩例卜辭中的驗辭揭示了一種運行方式。在第一例中，命辭是以謂語動詞「擒」（網獲）結尾，占辭只是對貞卜人物的說法加以確認。從命辭和占辭可以看出，動詞「擒」可以及物也可以不及物，在第二例中亦是如此。

在第一例中，史官沒有在驗辭中再次使用「擒」這個動詞，而是將獵獲的動物列為賓語。但在第二例中，史官卻不得不在驗辭中的直接賓語「四鹿」前加上「擒」。這是由於，儘管命辭的內容是關於狩獵的，但此處核心問題卻是狩獵的場所。當動物作為狩獵卜辭的占卜對象時，貞卜人物通常會使用「擒」或「遘」這類的及物動詞。記錄規則大致如下：如果貞卜人物在狩獵卜辭中使用「擒」或「遘」來作為尾字，那麼史官在驗辭中記錄獵獲或者遇到的動物數量時，就可以省去這個字。相反，如果貞卜人物沒使用這兩個字作為尾字，那麼史官就必須在驗辭中寫明，以保證語法正確、語言連貫。

下面是一個典型例子，其命辭以「遘」作結，驗辭則不再出現此字：

16 例如 HJ 6057f (武丁時期賓組): 癸巳卜, 殼貞: (命辭:)「旬亡憂。」(占辭:)王占曰:「出(有), 其出(有)來艱。」(驗辭:)气至五日丁酉, 允出來〔艱〕自西。沚或告曰:「土方征于我東畷, 〔戕〕二邑, 舌方亦禱(侵)我西畷。」王的占辭「其出來艱」在驗辭中得到了驗證, 不僅確實有人帶來警報(來艱), 驗辭還記錄了來者的姓名和話語。吉德煒稱這種習慣作「竭力保持歷史記錄的準確性」。Keightley, “Theology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207.

乙未卜：子其田从圭求豕，𪚩（遘）。用。
不豕。一三三 HYZ 50.3 (圖 28)

驗辭是由否定副詞「不」和名詞「豕」組成，缺少動詞，看上去在語言學角度並不連貫。然而，史官正是有意刪去了動詞「遘」，因為命辭正是以這個字作結的。史官知道在此處應該刪去動詞，證明了其在甲骨卜辭記錄方面的知識水平。去一個叫「圭」的地方打獵，尋找豬，而實際上並沒有遇到豬。史官準確地記錄了一次錯誤的判斷。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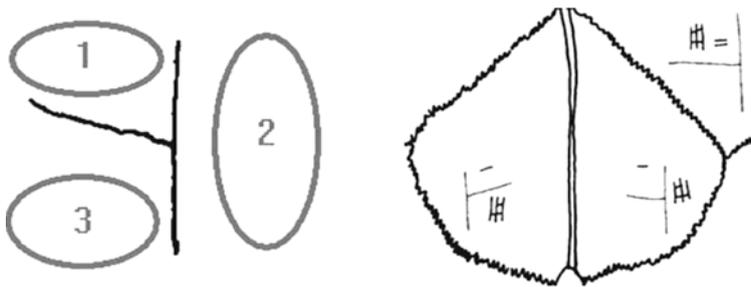


圖 1 (左)兆豐的三個部分;(右) HYZ 15 號甲骨片上的用辭「(茲)(卜)用」

正如腳注 1 的數據所示，閱讀一版花東甲骨，主要是關注文本是如何設計和排布在龜腹甲上的。這些專業史官在貞卜人物仍在使用的龜腹甲上書寫，其最顯著的特徵是，在卜辭與對應的一個或多個兆豐之間，保持著嚴格的距離。圍繞兆豐的自然分布進行創新性設計布局，通常會利用我所說的兆豐的「圖像」。如圖 1 (左) 所示，兆豐

¹⁷ Keightley, "Theology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207–27.

由兆幹（縱）和其上岔出的兆枝（橫）組成。兆豐的圖形被自然劃分為三部分，我以 1、2、3 標記。

圖 1（右）展示了用辭「用」在這三個區域的記錄方式，如前所述，「用」就是「茲〔卜〕用」的縮寫。HYZ 15（圖 1）的三個兆豐可能是一組占卜中的一部分，關鍵點在於，史官有意使用三種不同的行款來記錄相應的用辭。史官的技能因此得以展現，這也證明了史官在甲骨卜辭記錄上的專業性。

術語「用」或「不用」並不是要說明是否真的進行了占卜，否則「用」字如何成為對於命辭的回應或驗證呢？這種命辭史官不煩記錄。在 HYZ 15 和其他類似的卜辭中，比如圖 2 中的 HYZ 24，可以直觀地看到「用」在燒灼出龜甲兆豐後便記錄的，是對兆豐的一種判斷。

龜板上的書寫空間也受到另一面鑽鑿密度的影響（圖 2 右）。為了應對卜辭長度或圖形陳列等方面的特殊情況，史官們設計了一系列新的書寫模式。這種考慮主要基於兆豐位置和兆豐密度。（我用「兆豐密度」一詞來表示龜甲上同一區域內兆豐的數量。）同時，史官還需要考慮和計劃如何協調已經燒灼過的鑽鑿、兆豐，和與之相對應的卜辭，以及尚未燒灼的鑽鑿、兆豐，和將來會與之相對應的卜辭，我將在後文對此展開論述。史官或者事先知道貞卜人物將要在龜甲何位置進行下一次占卜，或者要靠猜測。（同樣，這是建立在史官與貞卜人物不是同一人的假設之下。如果是同一人，那麼這種設想當然也就不適用了。）

儘管其他商代貞卜人物傾向自龜腹甲右側開始，從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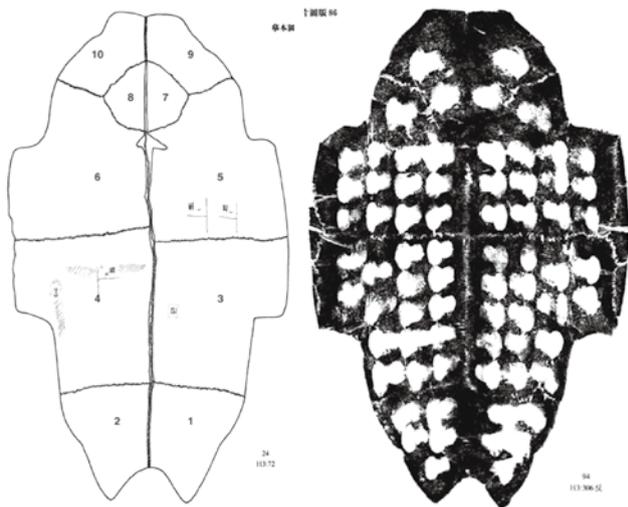


圖 2 (左) 龜腹甲由自然形成的邊界線(盾紋和齒紋)區隔為十個「有機」的書寫空間。在 HYZ 24 號上, 兆豐旁標注了序號, 並寫有用辭「用」;(右) 龜腹甲背面鑽鑿的密度 (HYZ 94)

部自下而上地灼龜, 並且由內至外使用鑽鑿,¹⁸ 但對花東貞卜人物來說, 這只是他們所用的方法之一。他們還傾向於由龜腹甲左側開始, 從頂端自上而下地灼龜, 並且由外至內使用鑽鑿。單片和多片成組的龜甲上的占卜順序表明, 貞卜人物也會隨機選擇鑽鑿灼出兆豐。

花東史官似乎更加關注「兆豐設計」—— 我用這個概

18 李達良專門研究了單塊龜腹甲上卜辭的位置和順序。他從《丙編》中挑選了三十多條辭例, 將它們分為 11 種不同的行款。見李達良:《龜版文例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 1972 年), 又收錄於《甲骨文獻集成》, 第 17 冊, 頁 219-269。崎川隆《賓組甲骨文分類研究》系統地介紹了賓組卜辭的設計布局。又參周鴻翔:《卜辭對貞述例》(香港:萬有圖書, 1969 年), 頁 12-36。

念而非「版面設計」，是用來指同一片甲骨上占卜刻辭與其所對應的一個或一組兆豐之間所呈現的布局和風格。筆者用「版面設計」來表示占卜記錄在完整的龜甲和胛骨上的布局和契刻風格。儘管帶有刻辭的完整龜甲在視覺效果上可能不如同時期商王武丁手下賓組貞卜人物精心設計過的卜辭那樣精美，¹⁹ 但花東史官可以稱得上是刻辭「微布局」和「微展示」的專家，以專門記錄與一個或一組兆豐相應的占卜。

一般來說，花東史官慣於從兆枝（總是指向龜甲的中分線）的上方開始，垂直於兆幹書寫卜辭。龜甲最內側兆豐的相應刻辭通常不會超過六至八字，整條卜辭被安排在區域 1（圖 3）。而超出六至八字的較長刻辭，則有三種布局。其一，刻辭的起始位置與簡短刻辭大致相同但略高，行文越過兆幹之後轉下行（圖 4 左），這種刻辭被安排在兆豐的區域 1 和 2，我稱之為 r 形行款。第二種布局是 r 形行款的延伸。刻辭行文至兆幹的底端之後，繼續以包圍結構環繞於兆豐底部（圖 4 右）。這種刻辭被安排在兆豐的區域 1、2 和 3，我稱之為 c 形行款。第三種布局是在兆幹後方縱向排列卜辭（圖 5）。



圖 3



圖 4



圖 5

¹⁹ Schwartz,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from Huayuanzhuang East*, 39–41.

在圍繞單個或成組的兆豐書寫卜辭時，花東史官主要採用五種方式。

- (1a) **對稱與平行的行款**。指圍繞在一個或一組兆豐旁的內容以對稱方式排列（指兆枝相指），起止都在同一條縱軸上；或者呈等長的縱向排列。
- (1b) **字數平衡的行款**。指用均分或遞減的方式排列文字。例如，對一條八個字的卜辭，四個字寫在兆豐區域 1，四個字寫在兆豐區域 2；對一條十五字的卜辭，三個區域各寫五個字。
- (2) **形式導向的行款**。指在兆豐的不同區域書寫卜辭的不同部分：敘辭、命辭、用辭、驗辭。根據兆豐的自然分域劃分一條完整卜辭，以便於閱讀。
- (3) **語法導向的行款**。指用語法分析的方式將卜辭劃分為詞彙單位，據此進行安排。除了利用兆豐的自然分域，史官還會巧妙地使用這種方法來使卜辭的內容更易於解讀。
- (4) **無定式行款**。指卜辭的布局與相應兆豐自然區域的劃分幾乎沒有關係，史官在書寫詞簇和詞鏈時不考慮斷句的問題，對卜辭的排布總體上顯得笨拙且缺乏統攝。相應地，同組其他史官的書寫卻暢通無礙。將這種行款設計——或者說沒有設計——的布局與其他三種方式相比，可以看出有些卜辭別出他手。

二、占卜中最常見的空間布局概覽

兆鑿的位置和占卜的次序，兆鑿的位置和占卜的次序，與卜辭相應的兆鑿和文本的設計布局，兩者存在差異。前者屬於貞卜人物的技術與方法，後者則屬於史官的技能。²⁰ 假設史官和貞卜人物兩個群體不僅要合作，且貞卜人物在鑽鑿甲骨、擇用兆鑿時不必受史官的干預，那麼史官則至少要履貞卜人物之步武，遵照後者挑選的鑽鑿和灼出的兆鑿。史官的任務就是根據這些兆鑿，在有限的空間條件下創造出程式化的設計布局。不過，花東刻辭系統並不止步於此。多樣的行款風格表明史官具有美學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他們具有自主意識的讀寫能力，以及對對話、句法和語法的認知，這些都說明史官群體的專業性已經到達了更深入、複雜的層次。除了文字書寫方面的專業性和創造力，這些刻製甲骨文的史官對於花東模式也表現得十分老練，或是日臻熟稔。一個可能的猜想是，史官群體中的一位或多位年長的史官要負責創製或傳播、教授這種模式。

比起在紙張上書寫，直接在占卜所用的甲骨上進行記錄當然大不相同，且複雜得多。就行款方面來說，史官更

20 例如，李達良在《龜板文例研究》中就沒有這種區分。儘管他關於「頁面設計」的圖表有助於描繪各種布局模式，但他真正研究的是描繪貞卜人物選擇要燒灼的鑽鑿的順序。又參 David N. Keightley,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4–25.

重要的能力之一應該是協調單片甲骨上空間布局與兆豐的對應關係，以及如何在多片甲骨上連續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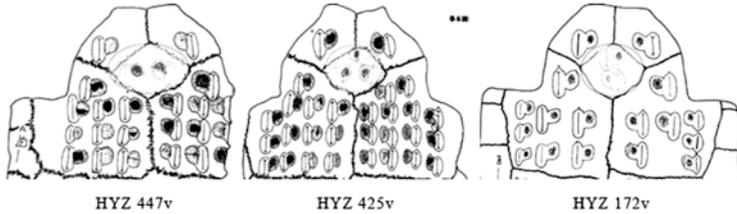


圖 6 龜中甲上較常見的三種鑽鑿排布

在龜腹甲的中甲部位進行的鑽鑿燒灼和書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花東材料中總計有九種鑽鑿的排布（圖 6）。²¹ 龜腹甲的這個部位所提供的書寫空間最為狹小，這裡的行款也與他處有所不同。相對於其他部位的兆豐，中甲兆豐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們可以橫跨龜甲中央的千里路。對花東的史官來講，這種情況並不理想，因為他們的書寫習慣並不傾向於讓甲骨文字越過中線。但是，由於史官群體嚴格遵守將兆豐與卜辭緊密結合的原則，因此權宜之計是，如果兆豐的兆枝越過了中線，那相應的刻辭也會越過中線（圖 7）。

21 孫亞冰：《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例研究》，頁 7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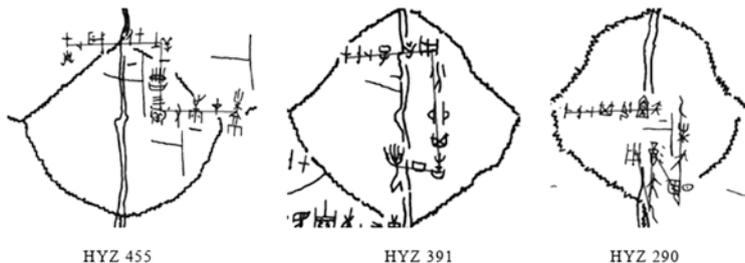


圖 7 中甲兆豐和書寫舉例



圖 8 (左、中) 同一片龜腹甲上的刻辭，方向沿兆枝背離兆幹。(右) 逆兆枝方向、朝向兆幹的刻辭

一般來說，龜甲同一側的單個和成組兆豐的空間布局可以總結為以下幾種：

(1) 對於簡短的卜辭，它們對應最內側（指龜甲的中央縱分線）或最外側邊緣的兆豐，史官傾向於將內容納於一行之內，方向與兆豐的兆枝指向相反（逆兆）或相同（順兆）。如圖 8 所示，刻辭通常被安排在龜甲盾紋與兆豐兆枝上方的空間內。

(2) 最常見的排布是 c 形行款。這種行款包圍著兆豐的全部三個區域。如圖 9 所示，其行文方向往往與兆枝指向相反，首尾字的位置處在同一條縱軸上。至於我前文所

說的 r 形行款不過是刻辭不夠長，無法形成一個 c 形，只能在兆豐的區域 2 結尾。

(3) 對於下腹甲和舌腹甲最外側鑽鑿形成的兆豐，刻辭的書寫傾向是在兆幹背後呈縱向行款排列（背兆）。圖 10 中的三個例子即是此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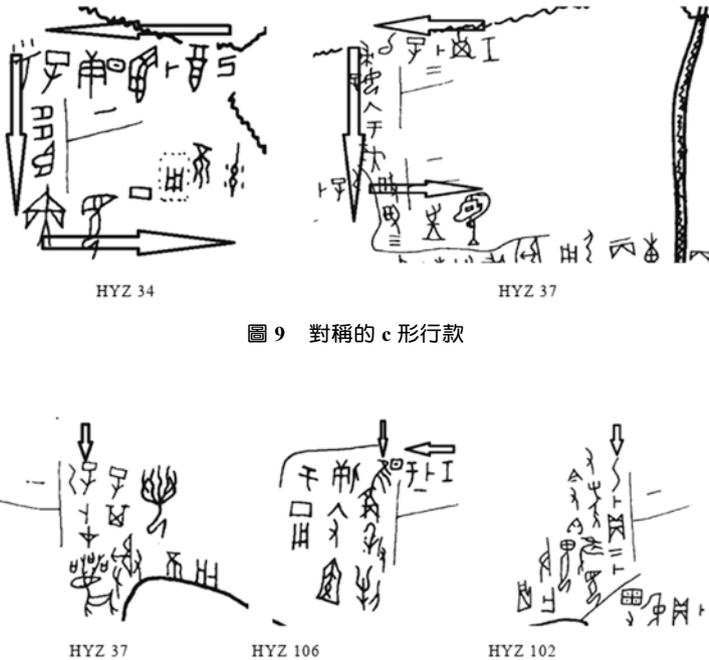


圖 9 對稱的 c 形行款

圖 10 縱向行款

三、三種基本行款：逆兆、順兆和背兆

由於大部分花東卜辭都對應一個或一組特定的兆豐，史官創造了新的模式來應對多種兆豐的排布。兆豐主要有

三種排布模式：單個兆豐、兩個兆豐成組（通常是在龜甲上對稱的位置左右相向），以及多個兆豐成組。如前所述，刻辭的書寫有三個基本方向。這三種基本行款通過調整，又可以綜合生成一些特殊風格以應對特殊情況，詳後文。



圖 11 龜腹甲右側的刻辭（HYZ 3）處於兆豐的正上方，為橫向行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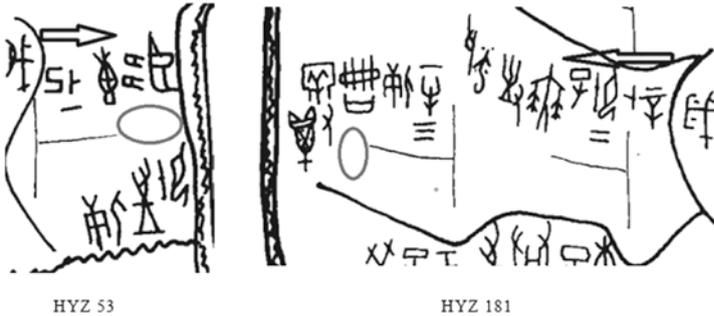


圖 12 刻辭越過兆幹之後，行款轉而下行

最常見的卜辭行款是逆兆，指刻辭向著兆幹書寫，而背離兆枝裂開的方向。行款遇到兆幹時，剩餘行款的走向要視乎剩餘內容的長度，以及甲骨上兆豐的位置。另外，

通常短刻辭連貫地寫在一行之內，而長刻辭則會環繞兆壘的多個區域。

順兆與逆兆的行款排列相反，指刻辭向兆枝裂開的方向書寫，背離兆幹。這種布局並不常見，多用於安排龜甲內部的短刻辭（圖 11）。值得注意的是，史官不會在順兆的情況下使行款向下轉折。這可能只是一種風格方面的考慮，但我認為有更深的含義。對於分行書寫的順兆卜辭，史官會在兆枝的末端留空，使上下行之間保持距離，或者是在離兆枝較遠的地方書寫下行行款（圖 12）。

在書寫龜甲外側兆壘的兆側刻辭時，會在兆幹背後使用縱向行款。就視覺效果而言，似乎出現了將兆幹外側排成引導線的傾向。當需要書寫多列文字時，史官喜歡依照比例，以整齊的格式來呈現內容。縱向刻辭往往從兆幹的頂端起頭，首行的長度與兆幹相當。

（一）兆壘位置與兆壘密度對行款的影響

龜甲上兆壘的位置與相同區域內兆壘的數量，影響甚至有時候決定了行款的形式。龜甲的自然輪廓和紋路為史官提供了大小不一的書寫空間。史官們似乎已考慮到刻辭與兆壘的距離，因為這關係到以後如何在尚未燒灼的鑽鑿周圍進行刻辭。關於兆壘的位置如何影響行款的模式，前文在中甲刻辭處已經討論過了（圖 6）。

一般來說，如前所述，最內一列的兆壘所對應的 8 字以內的簡短銘文大都呈一橫行排列，且不會越過兆幹（作為界線）。究其因由，似乎是為了避免與同在龜甲一側的

其他兆豐、兆側刻辭混淆。另一方面，龜甲最外側較長的兆側刻辭則往往會利用甲橋提供的額外空間。寫在此處的刻辭可能會向外逸出，尤其是在其下還有其他兆豐和刻辭的情況下，如下圖 13 中的上半部分。



圖 13 利用甲橋避免混淆 (HYZ 286)



圖 14 (左) 龜甲左舌腹甲左上角的刻辭，行款與紋路契合 (HYZ 3); (右) 右舌腹甲右上角斜寫的兆序「三 (四)」 (HYZ 182)

龜甲外側的刻辭，甚至是某些兆豐，常常會帶有一定的角度或弧度（圖 14）。刻辭的折角或彎曲是為了模仿龜甲的自然紋路和特徵。

（二）龜背甲與牛肩胛骨

H3 坑 529 片有銘甲骨中，有 13 片龜背甲刻辭和僅僅 5 片牛肩胛骨刻辭。安陽貞卜人物的占卜材料的內部分布情況的統計是相對不確定的，但有幾個相關問題：為甚麼花東貞卜人物在龜腹甲充足的情況下，仍然選擇龜背甲和牛肩胛骨來進行占卜？這兩種材料是否由不同的貞卜人物操作？占卜的主題是否決定了占卜所需的材料？H3 坑所見的刻辭中，為數不多的已經燒灼與契刻的龜背甲和牛肩胛骨，使得分析史官怎樣在這兩種材料上記錄卜辭變得更加容易。

占卜所用的龜背甲並不像一般的龜背甲或牛肩胛骨那樣保持完整，而是從中縱向剖開，分成兩半。²² 龜背半甲上的兆豐和刻辭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特徵，作為書寫材料，它擁有天然的格子，而且比龜腹甲的區隔要多得多。

如前所揭，排除甲橋，龜腹甲可以自然分為十個部分。而如圖 15（左、中）所示，龜背半甲包括 30 個自然分區。最接近縱剖線的一列區域（共 11 個，其中兩個是左右兩半甲片共有的）是最小的，大小基本一致。中間一

²² Keightley,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13–14.

列（共 8 個分區）空間最大，可以容納更多的兆豐和刻辭，其大小自上而下遞減。最外側的分區包含一個弧形外緣（共 13 個分區），除了頂端和底端兩個分區是左右共有的，分區大小也都相近，但比最內側的分區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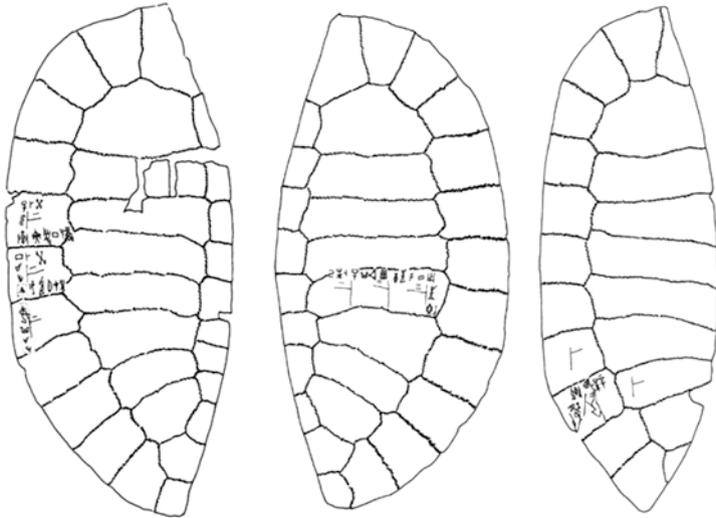


圖 15（左、中）近乎完整的左半甲（HYZ 262）和完整的右半甲（HYZ 297）；（右）較窄的左半甲（HYZ 332；共 21 個分區），除去了內側分區

從這些分區的大小可以看出，內側的分區只能容納一個兆豐；中間的分區可以橫向容納多個兆豐——通常是三個（如圖 17 所示的三個一組的兆豐）；而外側的分區，正如圖 15 所示，雖然每個分區可能在背面有多個鑽鑿，但通常也只有一個兆豐。

下面，我將總結龜背甲和牛肩胛骨上最常見的行款。



圖 16 (左) 龜背甲的右半邊，上有兩條同一日的卜辭，內容為狩獵，用線條隔開；(中) 龜背甲的左半邊，上有三條同一日的武丁卜辭，沒有人為的分割線；(右) 龜腹甲的右半邊，上有同一周內四天的六條卜辭，呈網格式排列

前面已經提到，龜背半甲最內和最外側的分區中通常只會有一個兆豐，若卜辭較長（圖 16），²³ 其刻辭會轉而沿兆幹下行（圖 16 左、中）。龜甲的盾紋形成了天然的網格，龜腹甲上這種「格子紙」的風格可能影響了史官對龜

23 史亞當（Schwartz）在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from Huayuanzhuang East* 一書中（版 259）採用了《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推測的順序，將 HYZ 262 最下面的卜辭排在首位，中間的卜辭在第二位，上方的卜辭在第三位。這是錯誤的。姚萱將其重新排列為（1）中，（2）下，（3）上，這是正確的。見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頁 307。上方卜辭（第三順位）是最先或者最後進行的，這個情況尚不明晰。但中間的卜辭包含日期（癸）和主題（王），而其下面格子中的卜辭則省略了日期和主題，應該晚於有日期和主題的卜辭。這種情況與貞卜人物和史官在按順序進行占卜時，對卜辭進行縮略的情況相符。另一種標注順序的方法是 1a/b 和 2。

腹甲書寫的設計。如圖 16（右），史官似乎模仿了龜背甲上的網格，四天之內的六條卜辭形成了塊狀的設計布局。可以想見，其後的卜辭將以點對點的方式勾連邊界，搭積木似的堆砌在這塊龜腹甲的上部。

龜背甲上單個分區內的兆豐和卜辭很容易辨識，通常不會與其他卜辭相混淆。然而，如圖 16（左）所示，史官有時候會在卜辭之間再劃出一條線，以免因連讀不同卜辭的內容而產生混淆。



圖 17 龜背甲右半邊中間的分區中，一條對應了三個兆豐的卜辭（HYZ 297）

龜背半甲的中間分區較寬，非常適合按照兆序橫向排列成組的兆豐。圖 17 展示了史官如何為成組的三個兆豐書寫一條 14 字的卜辭。

H3 坑所見的五片牛肩胛卜骨無一完整。不過，可以對相對最為完整的 HYZ 115（圖 18）作初步評論。這片骨頭的「扇面」（岡下窩）部分沒有刻辭。（骨頭的這片區域較為寬闊，「扇面」之名是由於其形狀與中國傳統的折扇形狀大致相似。）花東的史官習慣於保持兆豐與刻辭之間的緊密關聯，因此不會在這個區域寫字。

花東史官在牛肩胛骨上的書寫習慣與同時期商王史官有所不同。尤其是在為商王刻寫祭祖卜辭的時候，直接隸

屬於商王及其繼承人的史官們習慣讓卜辭遠離兆豐，縱向排布在骨板的中央。²⁴ HYZ 115 中從上往下第三格的卜辭是一條關於祭祖的長卜辭。儘管是孤例，但保證兆豐與刻辭的緊密關係看上去比整版的布局設計更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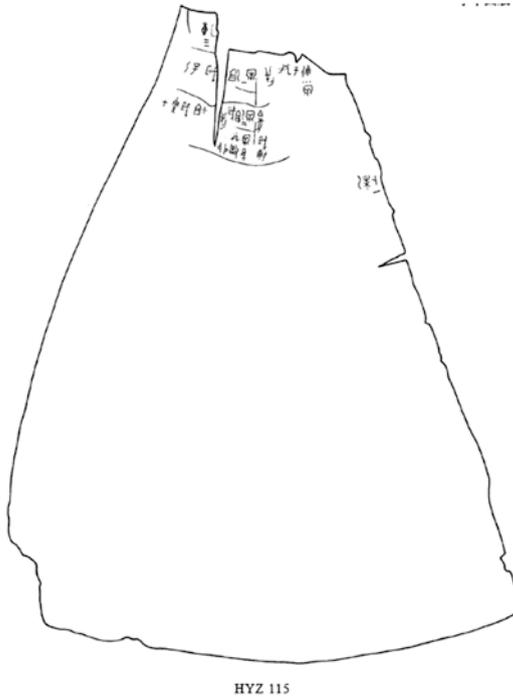


圖 18 牛肩胛骨上的卜辭

花園莊東地
H3 坑
甲骨的
閱讀方法

²⁴ Keightley,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51.

(三) 行款

1. 對稱與平行式

(1) 對貞刻辭

武丁時期的貞卜人物在進行占卜時，偏好以配對的方式處理所要去占卜的對象。比之對單一結果進行預測，他們更喜歡提出一正一反的一對命辭。²⁵ 這些成對的正反對貞卜辭通常會在龜甲的左右兩邊對稱的位置製作兆璽以及書寫刻辭（圖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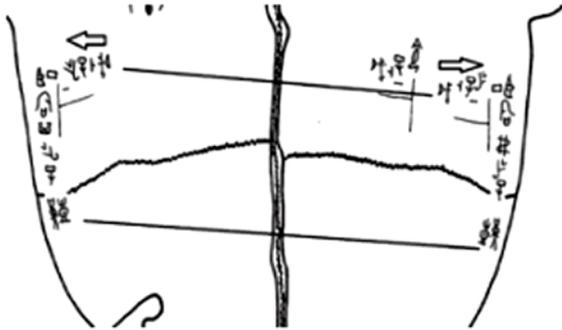


圖 19 對貞卜辭 (HYZ 75)

(2) 首尾對稱

對於圍繞兆璽排列的刻辭，最常見的布局是對稱設計，利用兆璽圖形作為引導，首尾字保持在同一條垂直線

²⁵ David N. Keightley, “The Shang: China’s First Historical Dynast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ed.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43.

上。(後文稱之為首尾對稱。) 有些刻辭似乎有意將首尾字位置與兆枝的末端保持一致，如圖 20。在首尾對稱的刻辭中，HYZ 481 (圖 20) 是個特例，它圍繞著成組的兩個兆璽。首字「丙」、尾字「若」以及用辭「用」都位於同一縱軸上，並分別安排在兩條兆枝的上、中、下三個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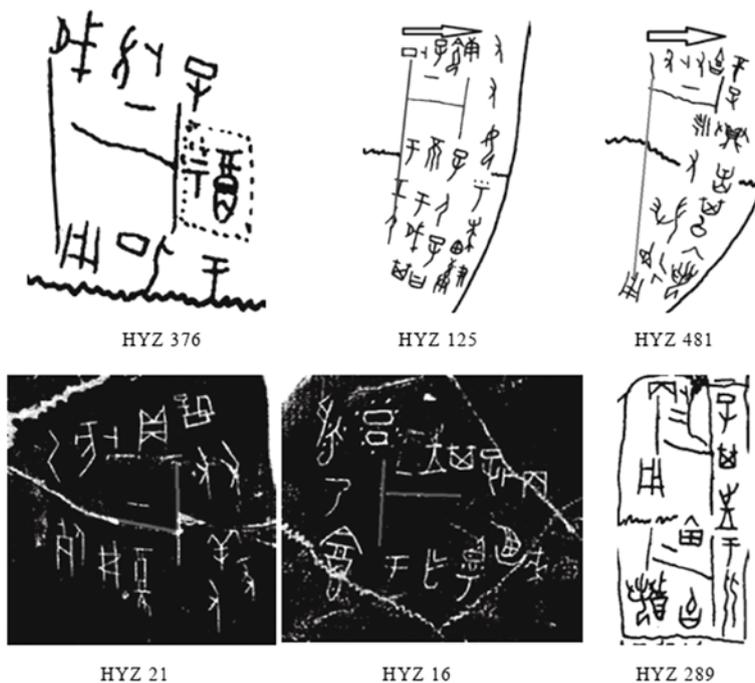


圖 20 首尾對稱

為了在比例和平衡性上達到協調，花東史官通常會放大字形，以及利用間隔。如圖 20 (HYZ 376) 所示，此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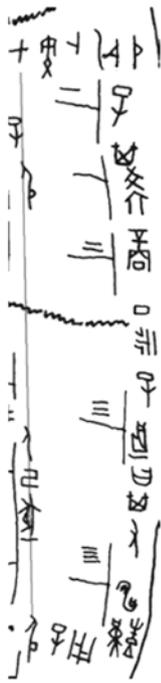


Figure 21: HYZ 336

圖 21

卜辭有九個字，「裸于妣丁用」幾個字的間距被拉大，從而實現首尾對稱。這種策略同樣也被用於其他卜辭。在 HYZ 21 和 HYZ 16（圖 20）中，文字的縱向間距被拉長，以保持首尾對稱。

最長的首尾對稱刻辭見於 HYZ 336（圖 21）。卜辭從最上角「甲寅」的「甲」字開始，沿龜甲的整個右緣下行，將一組縱向排列的兆豐包裹在內，至左下角人名「子髀」的「髀」字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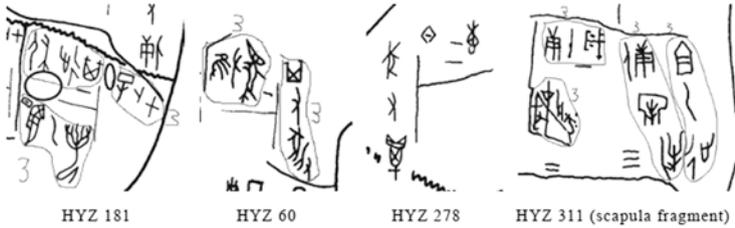
(3) 單個兆豐的字數平衡布局

前文說過，這種布局是指將卜辭按字數（包括合文）以均分或遞減的方式橫向或縱向排列，兆豐在其間起到界隔的作用。最常見的是四字一組的排列，後文用 $4+4(+4)$ 的公式表示。其次是三字和五字一組的排列。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縱向排列中，如果卜辭不能被均分，將調整部分文字所佔的空間，以在視覺上達到相似效果。下面是一些單個兆豐的字數平衡布局的例子。我將成組的文字勾劃出來，且注明字數，並在史官有意留白的地方添加圓圈。

A 單個兆豐字數平衡布局的例子：四字一組



B 單個兆豐字數平衡布局的例子：三字一組



C 單個兆豐字數平衡布局的例子：五字一組



(4) 成組兆豐的字數平衡布局

指在龜甲的同一側，將兆側刻辭按字數（包括合文）以均分或遞減的方式進行排列。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兆

豐用作分界線和引導線。如圖 22 所示，一條卜辭（HYZ 149.8）有 12 個字（包括一處合文），另一條卜辭（HYZ 5.10）有 16 個字（包括一處合文「王婦」），兩者都以五字為一組，安排在橫向排列的兆豐形成的區域內。其公式為 5+5+5 和 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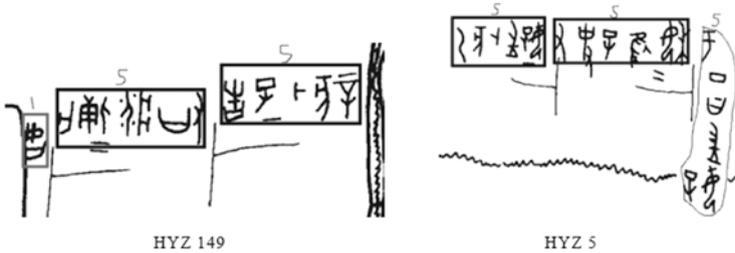


圖 22 成組兆豐字數平衡布局的例子：五字一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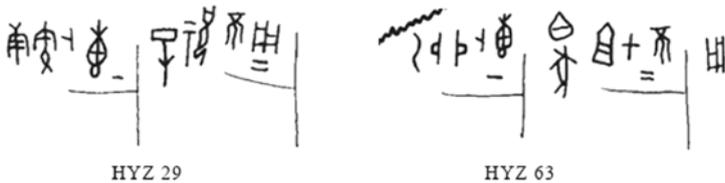


圖 23 成組兆豐字數平衡布局的例子：四字一組

下面用兩個例子來說明橫排成組兆豐中四字一組的字數平衡布局。

用辭「不用」出現在兩條卜辭的末尾，但書寫風格有所不同。在 HYZ 29.3（圖 23）中，兩個字被放在一起作為一個詞組，以維持字數平衡的布局。而在 HYZ 63.6（圖 23）中，兩個字被分開了，「不」字在兆豐區域 1 中，「用」

字在區域 2 中，同樣也是為了維持字數平衡的布局。²⁶

(5) 單個兆豐的縱向背兆字數平衡布局

安陽地區的王室甲骨史官在牛肩胛骨的骨嵴上用四字一組的縱向字數平衡布局來書寫卜辭，並用一條橫線來區分不同條目的卜辭。四字一組的縱向排列也常見於商代和西周的青銅酒器銘文。這種模式同樣也為花東史官所採納（圖 24），但也有三字、五字一組甚至兩字一組（少見）的布局（HYZ 468、HYZ 431、HYZ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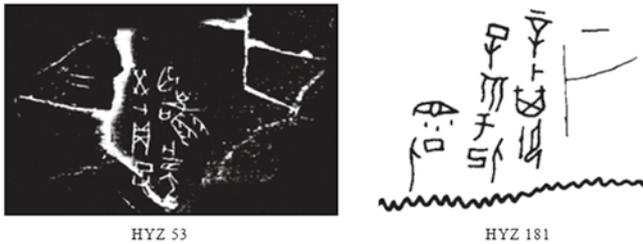


圖 24 四字一組縱向字數平衡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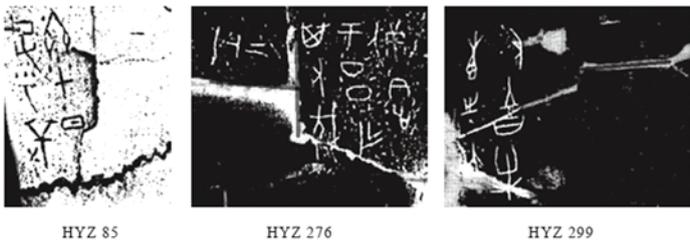


圖 25 三字一組縱向字數平衡布局

²⁶ 要將 HYZ 63.6 解讀為四字一組，需要將「白豕」看作合文，而將「祖甲」看作兩個字。由「日期」、「顏色 + 物體」、「物體 + 數量」、「祖先稱謂 + 廟號」組成的合文經常被用來協調字數平衡的布局。

HYZ 181.22 (圖 24) 的刻辭有 12 字，含 2 處合文：第二列末尾的「匕(妣)己」和第三列末尾的「匕(妣)丁」。刻辭總體呈四字一列的字數平衡設計。請注意第三列三個字（其中兩個組成合文）的位置，它們是從該列的中部起始，以保證在下方齒紋（摹本中的波浪線）處結束，使行款保持平行。這種類型的調整在花東刻辭中比比皆是。圖 25 是一些三字一組縱向排列的例子。²⁷



圖 26 (左) HYZ 449；(中) HYZ 37；(右) 每列字數遞減一個的縱向卜辭，其背面鑿鑿的排布

兩列以上較為複雜的平行布局有時是按照每列字數減一的方式來設計的。例如，第一列五個字，第二列四個字，第三列三個字，以此類推。圖 26 的兩例分別是 5+4+3 和 4+3+2+1 的排列。在 HYZ 37 中，史官在卜辭的開頭把「乙巳」寫成合文，這樣敘辭就可以容納在一列之內，以形成預期的設計。

²⁷ 圖 25 (中) 的 HYZ 276.3 實際上是一個 2+3+3+2 的布局。兆豐區域 1 的文字記錄了占卜的日期，以及「卜」字。兆枝上方的數字「二」是兆序，寫在卜辭之前。命辭有九個字（一處合文），分為三列，每列的首字與區域 1 的文字處在同一水平線上。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下腹甲最外側的兆側刻辭，以及甲橋內下角的兆側刻辭（圖 26 右，鑽鑿已經勾勒出）才使用這種字數遞減式的布局。我還注意到，這種特殊的設計顯然是為了貼合龜腹甲上這個特殊區域的自然輪廓。

較長的刻辭有一種更為複雜的行款形式，字數每隔多列才遞減一個。HYZ 320.6（圖 27）的卜辭有 19 字（含 1 處合文），共五列，三列為四字，兩列為三字（4+4+4+3+3）。²⁸ 另一個例子是 HYZ 161.1（圖 27），卜辭達 29 字（含 3 處合文），由區域 1 的一行和區域 2 的九列組成。第 2-5 列為每列三字，²⁹ 之後的 6-9 四列為每列兩字（3+3+3+3+2+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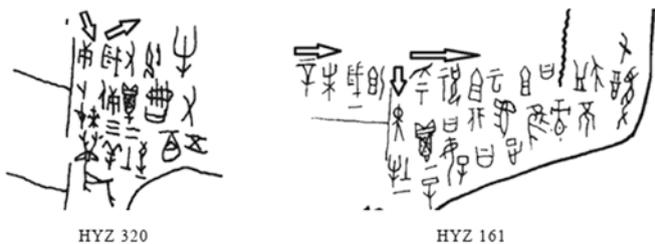


圖 27 每多列遞減一字的布局

- 28 如果把第三列的祭品「三羊」和第二列的「鬯二」看作合文，其布局為 4+3+3+3+3。還要注意第一列中史官如何刻寫「來」，「來」是「齏」的聲符，寫在「在」字的右邊。「鹿」旁寫在最底，作為這段文字的底部邊界。
- 29 第二列實際上有四個字，由於其中二字是合文（鬯一），所以此列只有三個字的格局。

(6) 使用兆幹的頂端作為平衡點

這種設計風格的創新性十分突出。史官巧妙地利用兆幹的頂端作為平衡點，來使兆璽每個區域中的字數保持相等。

以 HYZ 50.3（圖 28）為例，在三個橫向排列的一組兆璽中，14 個字的刻辭被平均分布在四個兆璽區域中。為了保證每個區域有且只有三個字，史官將第四個字「子」和第八個字「圭」分別寫在了前兩個兆幹的頂端。

在 HYZ 49.4（圖 29）中，史官將一條 14 字（含四處合文）刻辭中的第七個字「卯」（動詞，意為「對半分」）一分为二，使其分立於第二條兆幹頂端的兩側，實現了 3+3+3 的字數布局。

最後一個例子是 HYZ 240（圖 30），史官巧妙地安排了兩組相關兆璽，把「歲」（獻祭）和「宜」（割牲陳肉）兩個字（圖中畫圈部分）寫在兩個兆璽之間，從而使兩條卜辭形成了 2+2 的字數平衡。



圖 28 HYZ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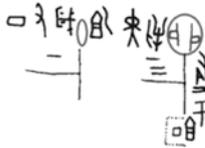


圖 29 HYZ 49



圖 30 HYZ 240

2. 形式導向的行款

「形式導向」的行款是指在設計和排布卜辭時，將其形式單位——敘辭／後辭、命辭、占辭、用辭和驗辭納入考慮範圍。雖然形式導向的行款和字數平衡的行款有時可以共存，但前者優先級更高。

對於單個兆壘來說，按照形式單位安排卜辭的一個簡單方法是，用兆幹將敘辭和命辭分開。圖 31（左）是一個圖示，右邊標注了兩個實例。

除了將占卜日期（前辭）與命辭分開，更複雜的行款還會繼續切割後面的其他單位（占辭、用辭）。圖 32（左）仍是一個圖示，但是在區域 3 多了一條用辭，右邊仍舊標注兩個實例。



圖 31 單個兆壘的兩個區域中的形式導向行款
（圖片中內容的翻譯：Preface 敘辭，Charge 命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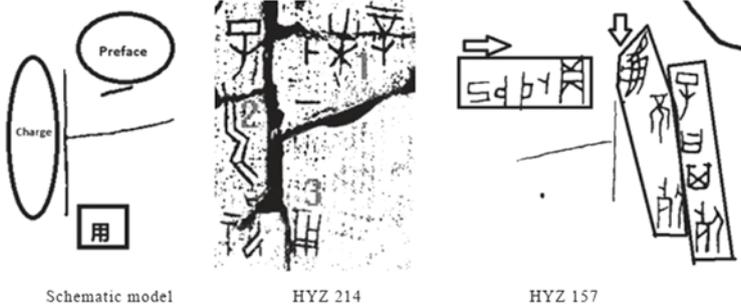


圖 32 單個兆壘的三個區域中的形式導向行款

在 HYZ 214.2 (圖 32) 的卜辭中，史官將前辭「辛未卜」寫在區域 1，命辭「子弔(勿)祝」寫在區域 2，用辭「用」寫在區域 3。

在 HYZ 157.7 (圖 32) 的卜辭中，史官將敘辭「己卯卜貞」寫在區域 1，命辭「龍不死」以縱向寫在第一列，占辭「子曰其死」在第二列。背兆的安排也是如此。圖 33 是其示意圖，右邊標注了一個實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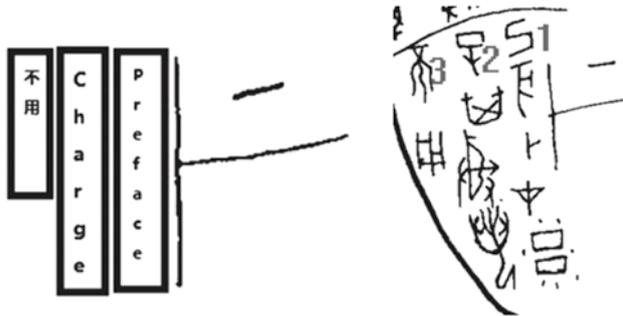


圖 33 (左) 基於形式的縱向行款圖示；
(右) HYZ 37，用數字標示出卜辭的不同部分

在 HYZ 37.10 (圖 33) 的卜辭中，史官將敘辭「己亥卜在雒」寫在第一列，命辭「子其射若」寫在第二列，用辭「不用」寫在第三列。文字整齊排列在兆幹之背與龜甲邊緣之間。卜辭上方還添加了邊界線，以與另一條卜辭區別開來。

3. 語法導向的行款

「語法導向」的行款是指依語法成分拆分書寫命辭和占辭。商代甲骨文中沒有標點符號，這樣拆解句子可能是為了模仿口頭語言的原始樣貌，也可能是為了表達史官對自己書寫內容的理解。無論是否自覺如此，這樣的行款都表明了如何閱讀這些句子。「語法導向」的行款有助於讀者分辨句子的成分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這樣的論點無疑有利於證明史官的知識水平——史官不僅認字，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人精通修辭語法。

不管人們是否接受史官書寫甲骨文是為了方便閱讀和查詢，依照形式單位安排卜辭和按語法拆解部分卜辭的行為，本身就說明史官如何理解他所書寫的內容。其中的意圖和技巧不言自明。

(1) 單個兆豐的兆側刻辭使用的語法導向的行款



例 1：HYZ 409.18 (圖 34)

丁卜：子令。囟(思)心。³⁰

圖 34 HYZ 409

這條卜辭共 6 字，在一個單個兆豐的兆背縱向排成兩列。該卜辭沒有使用 3+3 的字數平衡布局，而採用了語法導向布局。卜辭的最後一句「囟(思)心」正是貞卜人物想要得到的答案，該句單獨成列並且居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句話或許同時也是一句祈禱，被有意地與卜辭的其他部分區分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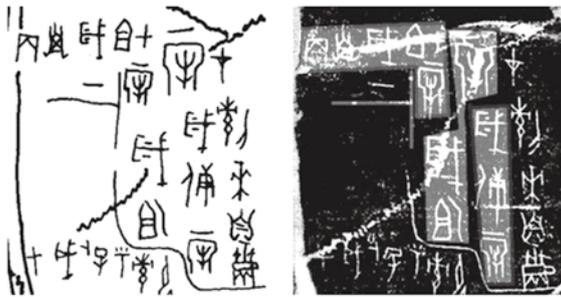


圖 35 HYZ 480 的摹本(左)和拓本(右)

30 這條卜辭是為了了解人們是否會心甘情願地服從王子的命令。

例 2：HYZ 480.6（圖 35）

丙子，歲且（祖）甲一牢，歲且（祖）乙一牢，歲匕（妣）庚一牢。才（在）割（葛），來自觶（唐）。—

這條命辭較為複雜，開頭兩字是日期，之後是三個並列的分句。（最後一列是後辭。）三個分句的構成完全相同：「歲（動詞，獻祭）+ 間接賓語（受祭者）+ 直接賓語（作為犧牲的動物）」。史官分解了這條卜辭，並在第一、第二、第三分句之間留白。第二句和第三句的書寫方向略有不同，以便做進一步區分。



圖 36 HYZ 226



圖 37 HYZ 6

例 3：HYZ 226.11（圖 36）

庚辰卜：舌（刮）彡（彤）匕（妣）庚，用牢又牝。匕（妣）庚衍（侃）。用。—

這段命辭包括兩個句子，一句複雜，一句簡單。第一句的主句以「用」字開頭，其書寫角度與以合文「妣庚」結尾的首句不同，以表明它是一個獨立的語法成分。儘管主句的結尾「又牝」以現有的方式書寫顯得行款不平衡且怪異，但這幾個字被當作一個語法單位，所以沒有分行。後辭「妣庚衍（侃）」是占卜者所希望得到答案的信息，這句話獨立成列，也是為了表明它是一個語法單位。此外，以免混淆和誤解，結尾的書寫方向與前面的句子不同。

例 4：HYZ 6.1（圖 37）

甲辰夕，歲且（祖）乙黑牡一，夷（惠）
子祝，若，且（祖）乙衍（侃）。用。翌日吉
（刮）。—

為了呈現這條卜辭，史官利用兆豐的圖形，將第一句的主句與前面的從句分開。從句以 r 形行款環繞在兆豐區域 1 和區域 2，區域 2 的文字被區隔開來，以使文字在兆幹的末尾結束。第一句的主句以「夷（惠）」開頭，其後的後辭則是以「且（祖）」開頭的，兩個句子都包含了貞卜人物希望得到答案的信息，然後被寫在區域 3。與例 3 的 HYZ 226 一樣，後辭「祖乙衍（侃）」整句單獨成列。卜辭在第四列以用辭和事件表記結束，首尾保持在同一縱軸上。

(2) 成組兆豐的語法導向刻辭行款

成組兆豐的語法導向刻辭行款與單個兆豐的此類行款不同。單個兆豐中，史官在劃分卜辭時，只能利用三個自

然的區域，相對狹小的間距，以不連貫的、非線性的角度來書寫。而對於成組兆豐，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的，史官都有更多的可利用空間，但這也意味著必須在龜甲的更大空間範圍內設計和書寫卜辭。

例 1：HYZ 32.2（圖 38）

庚卜，才（在）齏：衷（惠）五牲又鬯二用，
至（致）卣（禦）匕（妣）庚。—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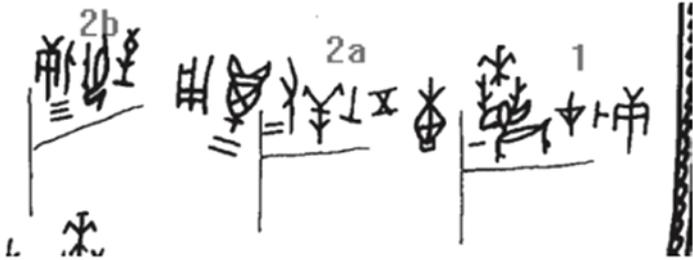


圖 38 HYZ 32

橫向排列的成組兆豐的兆側刻辭較為複雜，在處理這樣的卜辭時，一個方法是在每個兆豐旁分配一個語法單位。在 HYZ 32.2（圖 38）中，卜辭長 15 字（含兩處合文「鬯二」和「妣庚」），對應著一組三個兆豐。包含了占卜日期和地點的敘辭「庚卜在齏」寫在了第一個兆豐的區域 1（形式導向行款）。命辭的主句「衷（惠）五牲又鬯二用」，對應著第二個兆豐的區域 1。後置的從句「至（致）卣（禦）匕（妣）庚」，則對應第三個兆豐的區域 1。以這種格式書寫卜辭時，史官將敘辭限制在中軸線和第一個

兆豐的兆幹上半部分之間，以保持文本單元的完整，並將其與命辭（以「夷」開頭的部分）區分開。首句的最後一字「用」，與第二個從句的首字「至（致）」之間還有留空。

例 2：HYZ 209.1（圖 39）

庚申卜，歲匕（妣）庚牝一。子屍（髀）卣
（禦）圭（往）。_{一二三四五六}

該卜辭有 12 字（含兩處合文），對應著一組六個縱向排列的兆豐，跨越龜甲右側三個不同的自然區域。第一個兆豐位於內腹甲，史官從龜甲左側開始刻寫，起點剛好位於兆幹的末端，文字右行越過了中央縱分線。文字環繞著第一至第四兆豐，命辭的兩個句子依其語法成分明確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句子以「歲」開始，以「牝一」結束，恰好終止於第二個兆豐兆枝的上方，而下一句以「子屍」開始，從靠右的位置，在第二個兆豐的兆幹背後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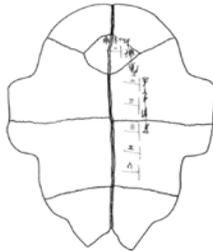


圖 39 HYZ 209



圖 40 HYZ 29，
經過標記的摹本
（上）和拓本（下）

例 3：HYZ 29.1（圖 40）

丙寅卜：其𠄎（禦），隹（唯）宁（賈）視
馬于癸子，𠄎（惠）一伐、一牛、一鬯，𠄎夢。
用。—二

這條卜辭比較複雜，它被安排在橫向排列的兩個成組兆豐旁。首句的敘辭橫跨兩個兆豐的上方。史官將介詞短語「于癸子」稍微向內移動，貼近兆幹，以與前面的內容分開，這使餘下的文字縱向排列。命辭的主句「𠄎（惠）一伐一牛一鬯𠄎夢」是貞卜人物希望得到答案的信息，這句與用辭一起，在兩個兆幹之間排成三列。從視覺角度來看，主句與用辭在中央的位置排成縱列，吸引了讀者對它的關注。

例 4：HYZ 241.11（圖 41）

辛亥卜，貞：玁羌又（有）疾，不死。子𠄎
（占）曰：羌其死隹（唯）今，其叅（瘳）亦隹
（唯）今。—二

這條卜辭的整體布局環繞在水平排列的一組兩個兆豐的三面，首尾對稱，十分老練。這條卜辭的設計難點在於其占辭較長。史官將敘辭和命辭寫在兆豐的上方，並在第二個兆豐的兆幹處行款轉下。命辭的末句「不死」調整了空間布局，以與整條兆幹長度相符，而兆幹的末端則指示了剩餘的占辭應當如何書寫。占辭以「子占曰」起始，

縱向寫在兩條兆枝的下方，排成七列，每列二字。占辭由兩個完整的條件句組成。兩個條件句正反相對，但結果相同。史官利用第一個兆豐的兆幹，按照語法分解了這兩個句子。看上去，敘辭和命辭佔據了兆豐的外部空間，其內部則由占辭填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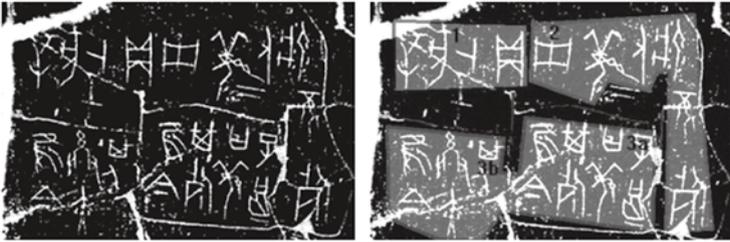


圖 41 HYZ 241，拓本，未標記（左），已標記（右）

（四）邊界線

史官會劃出各種形狀和長度的邊界線，其主要功能是劃分卜辭。邊界線保持了各條卜辭的完整和連貫，使其免於相互混淆。史官刻劃邊界線的行為表明它們應有重要的作用。³¹ 我認為，這種作用部分涉及文本呈現，以及撰寫文本的史官是如何理解刻辭的。

另外，邊界線還起到這些作用：框定文字、導引行款、連接斷掉的自然紋路，著重刻劃已有紋路、設定路線，以及為縱向行款劃定界線。證據表明，花東卜辭中的邊界線在卜辭刻好後才加上，或者在契刻卜辭時一起刻劃。

³¹ Keightley,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53–54.

花東卜辭中有兩種主要的邊界線：

1. 自然邊界線（如圖 2 所示）
2. 刻劃邊界線

1. 自然邊界線

花東史官創造性地應用了龜腹甲和龜背甲的自然紋路。兩種主要的應用是：

- (1) 區分不同卜辭（圖 42 左）
- (2) 框定單個卜辭（圖 42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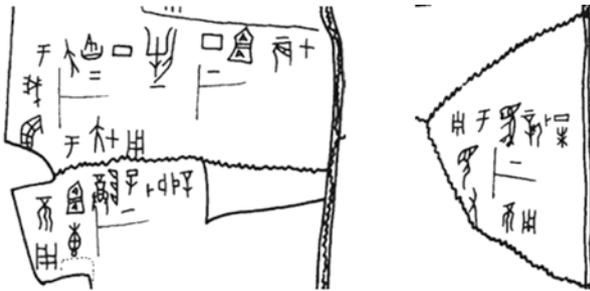


圖 42（左）HYZ 34；（右）HYZ 7；波浪線和雙鉤線表示龜甲上的自然紋路

2. 經過修補和校正的自然邊界線

圖 42 中 HYZ 34 上的兩條卜辭同出一手，這位史官利用龜腹甲的自然紋路來區分卜辭。這意味著，史官從讀者的角度出發，認為位於紋路上方的「于大甲用」（HYZ 34.4）可能會被誤認為與紋路下方的「子尊宜」（HYZ 34.2）同屬一條卜辭而連屬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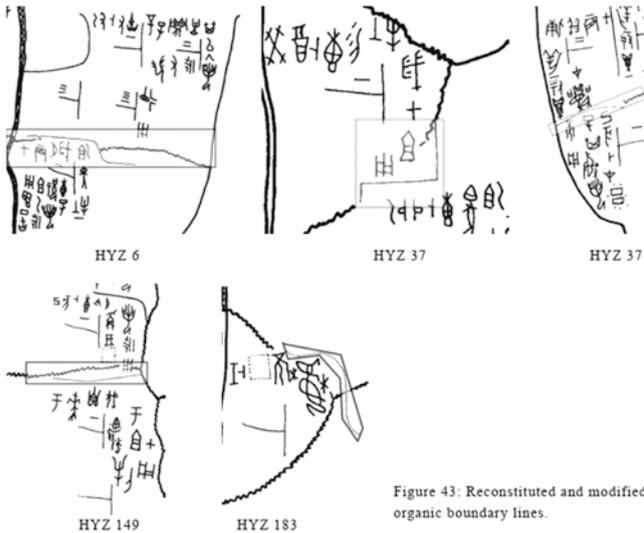


Figure 43: Reconstituted and modified organic boundary lines.

圖 43 經過修補和校正的自然邊界線

在圖 42 所示的例子中，無一字跨越自然邊界，這是花東史官的共同習慣。但有時文字也會逸出自然邊界，當這種情況出現時，一般來說，史官會在現有的自然邊界上加以刻劃，以對其進行修補和校正。這樣做的目的應該是為了保證每條卜辭的完整，以免與鄰近的其他卜辭產生混淆。圖 43 展示了五個這樣的例子。

3. 其他的史官刻劃邊界線

(1) 簡單分界線

一種簡單區分卜辭的方法是在卜辭文字相互靠近的地方劃一條短線。圖 44 展示了史官刻劃的各種形狀和長度的簡單分界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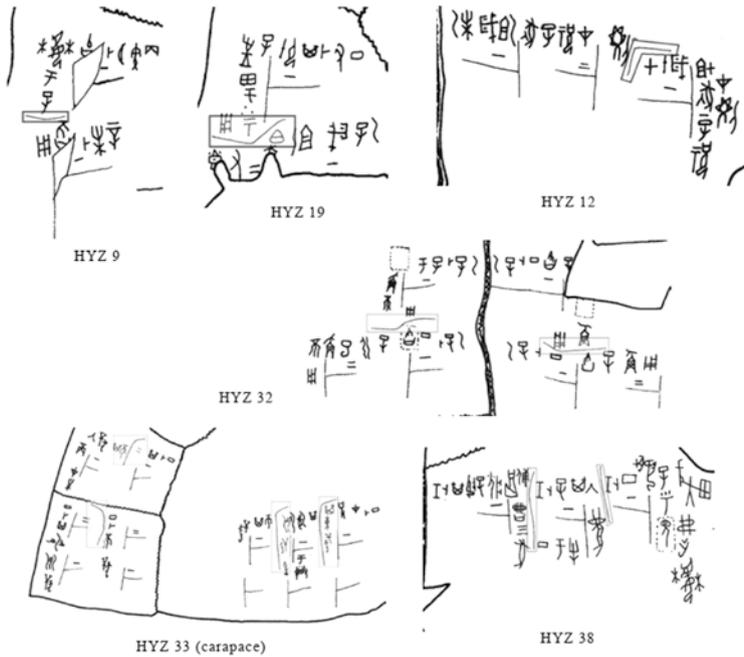


圖 44 簡單分界線

(2) 複雜分界線

當成組兆豐並非以橫向或縱向排列，尤其是當兆側刻辭的長度無法與成組兆豐相協調時，就需要較長、較複雜的分界線。

在圖 45 的 HYZ 4 上，一組兩個兆豐由一條長而曲折的邊界線勾勒出來，這兩個兆豐分別是在龜甲的上部和左側兩個自然區域燒灼出的。之所以需要這樣的分界線，不僅是因為這兩個兆豐之間相距較遠，其兆側刻辭也比較簡短，更重要的是，龜甲左側的第二個兆豐與右側的一個兆

豐（兆序為一），因為後者側刻辭越過了縱分線，可能會造成混淆。

在圖 45 的 HYZ 150 上，一條長而曲折的邊界線勾勒出一組五個兆豐，這條線跨越了龜甲的兩個自然區域。這條線是為了區分第四、第五兆豐上方的文字與另一條卜辭，同時也是為了保證這一組非線性的兆豐聯繫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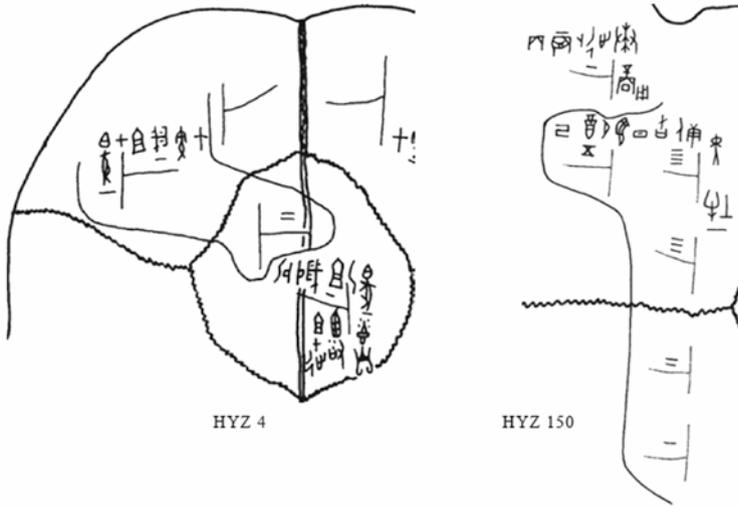


圖 45 複雜分界線

(3) 框線

在龜甲較為寬闊的下腹甲和舌腹甲部分逐步建立「方框」來區隔單獨的卜辭，這是花東卜辭的一個獨特特徵。這種設計是為了處理龜甲同一區域內高密度的、遞增的多個獨立兆豐及其兆側刻辭。HYZ 409（圖 46）顯示了這些同日（己日）劃出的方框是怎樣從密集的獨立兆豐及兆側

刻辭發展出來的。HYZ 409 上的方框，包含其中的兆豐和刻辭，是逐步構建的，與此相比，HYZ 416（圖 46）則是這類文檔或「頁面」設計中的精品。龜甲的右半邊是成品，整齊劃一的可辨識的文字由相連的線段劃分為一條條卜辭，占卜的時間前後跨度為四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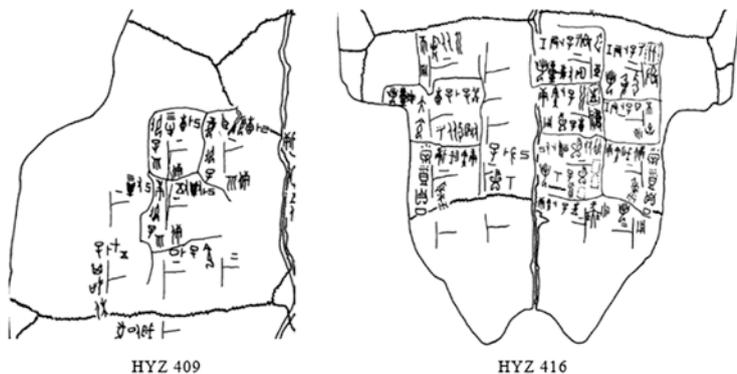


圖 46 複雜框線

(4) 縱向分欄文字

花東史官會在縱向書寫的卜辭行間增劃分界線（圖 47）。這種獨特的分解方式在全部花東卜辭中只出現過三次，其在整個商代甲骨文中的稀見性，使得這一新發現的意義更加重大。³² 史官利用分界線劃分行列，使文字的走向清晰明白。這些分界線，不是為了方便契刻，而是為了方便閱讀。

32 孫亞冰：《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例研究》，頁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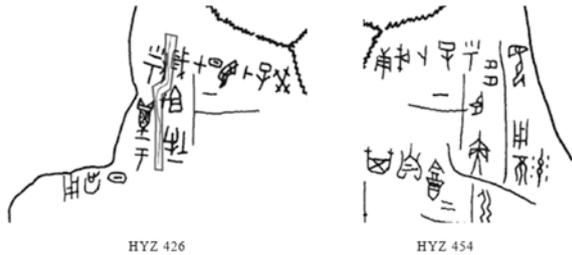


圖 47 縱向分欄文字

在 HYZ 426.1 (圖 47) 上，書寫這段刻辭的史官意識到，第二列第一個字「祱」(分界線的左邊)可能會與它前面的「歲」字(分界線的右邊)錯誤地連讀，因此史官在兩列文字之間添加了一條縱貫線，因為他從一個讀者的角度出發，意識到不這樣做可能會導致混淆和誤解。

在 HYZ 454.1 (圖 47) 上，史官則意識到，第二列第一個字「見」(分界線的右邊)可能會與它前面的「多」字(分界線的左邊)產生混淆。

(5) 預留邊界線

花東甲骨刻辭中有一些邊界線似乎是史官為以後的兆璽及兆側刻辭預留的。這說明史官刻劃邊界線不僅僅是為了框定卜辭和分隔文字，也為附近的空白區域勾劃輪廓。與其他邊界線不同，這種線條鈎勒處彎曲的弧形。這種特殊的形狀說明史官當時預期著與他們合作的貞卜人物將來會利用這些區域占卜。(但事實證明他們錯了。)此外，這些「指示性」的c形曲線背向已有的卜辭，似乎表明將來的卜辭會以c形行款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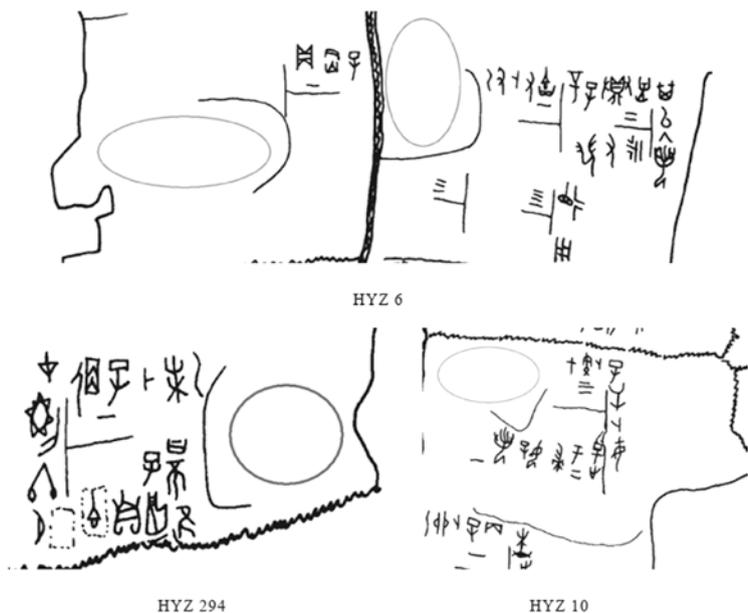


圖 48 預留邊界線

結論

1991 年發現的花園莊東地 3 號坑商代甲骨，自從三千多年前埋入地下後再不為人所知。在掩埋之前，見過它們的人亦只寥寥。

本文通過觀察甲骨刻辭的書寫細節，聚焦於商代卜辭記錄者的動機和意圖。這些商代史官為王族的某一位王子工作，並與同屬該王子的貞卜人物合作，這兩個專業群體發明並應用新的方法，以經濟地對他們的工作量進行微觀管理，保證連貫而有效地完成工作。史官們準確記錄了

占卜內容，並在這些記錄的設計、書寫和展示方面表現出獨特的能力和原創性。更重要的是，卜辭的呈現方式揭示了史官對材料的掌控能力，證明了其文化素養和才能，也意味著這些記錄是供人閱讀和查詢的。本文已經證明，這些專業的史官並不像前人所說的那樣只事雕刻，機械地記錄口頭語言和給定的材料。相反，正如我在案例研究中所詳細展示的，他們是極有能力的專業人員，對於甲骨文記錄熟練且具專業性。這些案例研究不僅證明史官具有很高的讀寫能力，還表明他們在語法結構方面的高水平語言能力。

我承認這項研究的方法具有局限性，只適用於 3 號坑的刻辭，但與此同時，我的研究的一致性，反映了更普遍而深刻的現象。為宏觀地總結商代中國史官的書寫模式提供了新證據。

閱讀甲骨刻辭是極具挑戰性的，任何能夠幫助閱讀理解的方法，都是十分重要的。本研究的重點是通過仔細研究花東甲骨的整體性和外在特徵，來完善針對花東甲骨的閱讀方法。行款的考察補充了語文的研究，而結合二者，可使這些深受史官傳統影響的獨特文獻的研究更全面可信。

參考書目

- 周鴻翔：《卜辭對貞述例》。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69年。
- Keightley, David N.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 “The Shang: China’s First Historical Dynast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232–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 “The Diviners’ Notebooks: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s Secondary Sources.” In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Discovery*. Edited by Yau Shun-chiu and Chrystelle Maréchal, 11–25.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1.
- . *Working for His Majesty: Research Notes on Labor Mobilization in Late Shang China (ca. 1200–1045 B.C.), as Seen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andicraft Industries, Agriculture, Warfare, Hunt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Shang’s Legacies*.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2.

———. “Theology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uth and the Ancestors in the Wu Ding Divination Records.” In *ibid*, *These Bones Shall Rise Again: Selected Writing on Early China*. Edited by Henry Rosemont Jr., 207–27.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李達良：《龜版文例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1972年。又收入於《甲骨文獻集成》，第17冊，頁219–269。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劉源：〈試論殷墟花園莊東地卜辭的行款〉，《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1期，頁112–116。

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裘錫圭學術文集》，第1卷甲骨文卷，頁321–32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釋厄〉，《裘錫圭學術文集》，第1卷甲骨文卷，頁449–460。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年。

———譯：《近東開闢史詩》。臺北：新文豐，1991年。

崎川隆（Sakikawa Takashi）：《賓組甲骨文分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 Schwartz, Adam Craig.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from Huayuanzhuang East*.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9.
- 宋鎮豪、段志洪主編：《甲骨文獻集成》，40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 孫亞冰：《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6年。
- 張桂光：〈花園莊東地卜甲刻辭行款略說〉，收入王建生、朱岐祥：《花園莊東地甲骨論叢》。臺北：聖環圖書，2006年。
- 張世超：《殷墟甲骨字跡研究——自組卜辭篇》。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 章秀霞：〈花東卜辭行款走向與卜兆組合式的整理和研究〉，收入王宇信等主編：《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中國福山）》，頁174-192。北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6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周忠兵：〈談新劃分出的歷組小類〉，《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二輯）》，頁222-2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